

保障房建設和監察考驗各級政府執政能力

雷添良 全國人大代表

保障房建設不但有助緩解日趨緊張的住房矛盾，還是保持我國經濟平穩發展的重要手段。中央就落實11月底前全國1000萬套保障性住房必須開工的硬指標，要求各地主要官員立下「軍令狀」。保障房的建設、分配和管理要實施最全面嚴格的監督，各級政府正面臨執政能力的嚴峻考驗，必須全力以赴，解決民眾就基本住屋的訴求。

讓中低收入者實現「住有所居」，是我國社會保障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近年我國保障房建設全面加速，去年共開工建設保障房590萬套，2011年將開工建設1000萬套。預計整個「十二五」期間，我國將建設保障房3600萬套，從而令我國保障房比例佔到房地產市場的20%，解決一億基層人口的住房問題。

一千萬套保障性住房11月底必須開工

按照計劃，今年11月底前1000萬套保障性住房必須開工。但來自中央有關部門的統計顯示，截至6月底，開工的只有500萬套，僅及半數。近日在黑龍江省視察時，我亦注意到當地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設進度是佔全年任務目標的48.3%。

事實上，保障房建設不但有助緩解日趨緊張的住房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化解尖銳的貧富矛盾，還是保持我國經濟平穩發展的重要手段。在國家持續採取宏觀調控措施抑制樓市過熱的大背景下，已有部分房地產企業資金鏈斷裂。而鋼鐵水泥、建材、家電等相關行業亦逐漸呈現出增速放緩的連鎖效應。在此背景下，保障房計劃能否如期推進，更關係到整個國民經濟能否健康運行。

按照住建部測算，今年要完成的1000萬套保障性安居工程，年度投資高達1.3萬億元人民幣。其中，8000多億元是通過社會機構投入和保障對象及其所在企業籌集來的。剩餘的5000多億元資金，將由中央政府和各級政府通過多種渠道來籌集。然而，投資保障性住房收益明顯較商品房收益低，投入大回報小，屬於公益微利項目，因此很難從正常渠道吸收到投資尤其是民間投資參與。所以，政府需採取行政手段，通過政策鼓勵等方式刺激民間資本的積極性，另一方面則需要提升企業尤其是大型地產企業回饋社會的責任感。

中央建房政令不容怠慢

我認為，落實11月底前全國1000萬套保障性住房必須開工的指標雖說困難重重，卻不容怠慢。如不能達標，「十二五」開局中最重大的民生工程以及經濟建設項目就將落空，中央以及各地政府對基層百姓的承諾也將失效。而且，今年三月全國兩會後，中央就落實11月底前全國1000萬套保障性住房必須開工這一硬指標，曾要求各地主要官員立下「軍令狀」。中央頒布的政令是否暢通，保障性住房的開工率已經成為一個中外觀的重要指標。

就毗鄰香港的廣東而言，經濟適用房的投資比重一度極低，去年竟居全國倒數第四，與這個全國第一的經濟大省的地位極不相稱。幸得扭轉這一不均衡結構，廣東迅速提升保障性住房的建設力度，今年一季度，廣東房地產開發完成投資同比增長28.5%，其中商品住宅投資增長31.8%，而經濟適用房投資增幅高達225.3%。

另一方面，廣東未來五年要建180萬套保障房，該任務已經寫進廣東省「十二五」經濟社會發展主要目標中，且註明是「約束性」指標。說明廣東不少地方的保障房建設將呈現十分強勁的爆發勢頭，而全國多個地區，也將同樣出現保障房動工白熱化的局面。

保障房分配要做到公平公正公開

然而，正是因為面對井噴式的保障房建設熱潮，值得我們特別關注的是有關部門是否能以科學務實的態度，傾盡全力加大住房保障的普惠度，並在分配上做到公平公正公開，以完全透明的運作和陽光政策，保證保障房成為社會穩定的重要基礎，而不是社會不公的另一誘發渠道。

此外，保障房建設必須鼓勵各地充分調動社會各方力量參與投資建設，明確企業和其他機構可投資建設公租房。鼓勵各類企業和其他機構可以獨資、集資或股份制的形式投資建設公租房，支持有實力的大型企業建設職工公寓，並給予享受有關優惠政策。機關企業單位在符合城鄉規劃的前提下，可以利用歷史自有土地建設公租房。同時，要通過社會輿論和企業文化教育，推動房企積極承擔社會責任，參與到保障房的建設中來。

保障房應以基本水平廣覆蓋為目標

根據我國國情，70%以上的城市常住人口都是中低收入家庭，因此決定了我國的住房保障制度只能以基本水平、廣覆蓋為目標，同時也應該是一個多層次的體系。其中第一層級是不足10%的極低收入的家庭、老人、病人等進入政府提供的廉租屋，通過這種方式來保證最弱勢群體的居住生存權。第二層級是佔絕大多數的中低收入民眾，在政府住房貨幣化補助、優惠利率、優惠稅收等優惠條件下通過限價商品房、經濟適用房、租賃經濟適用房、民工住房和中小戶型、中低價普通商品房等多種形式來解決。同時，要努力將住房保障覆蓋面從城鎮戶籍人口擴大至有基本穩定工作的城市常住人口，打破戶口限制，讓外來民工也能享受到保障房的福利和陽光。

此外，保障性住房在產品設計上應以中小戶型為主，着眼於滿足基本居住需求。同時要通過產業轉移和分散就業，緩解城市核心區人口壓力，更要考慮社會人文因素，通過不同階層、不同文化、不同種族，甚至不同宗教信仰合理搭配，促進融合和社會和諧，避免出現貧民區。而且要全面考慮配套，提供充分的就業、生活、醫療、教育等公共配套設施，尤其是便利的公共交通，以滿足人們出行的需要，不額外增加中低階層的生活成本。

最後，我認為保障房的建設、分配和管理要實施最全面嚴格的監督。嚴格控制套型面積，嚴格工程質量管理，並確保分配公平、公開、公正。同時要落實政府責任，強化督查考核和輿論監督。要令保障房的公平分配成為反貪防腐的高壓線，嚴防徇私舞弊。政府應定期抽查租戶的居住資格，並對不合資格而獲得住房安排的家庭作適當懲罰，使正在輪候租住的有需要家庭得到分配。各級政府正面臨就其執政能力的嚴峻考驗，必須全力以赴，完成工作目標，解決民眾就基本住屋的訴求。

美國難逃債務違約終極宿命

馬建波 資深評論員

一如筆者早前預期，「美國國債上限調增最終妥協方案將獲得通過，並將取決於奧巴馬政府的妥協」。香港時間8月1日凌晨，美國總統奧巴馬與國會兩黨領袖就債務上限達成與分段削減赤字計劃掛鈎的調增債務協議。奧巴馬政府以接受分段削減赤字2.4萬億美元的開支，促成國會兩黨取得調債協議的共識，並希望兩黨兩院支持通過8月2日的國會表決。

有利奧巴馬爭取連任

根據新協議，美國的債務上限將最少提高2.1萬億美元，奧巴馬政府未來需要削減2.4萬億美元的政府開支。債務上限也將分兩個階段提升，以應付聯邦政府2013年前即：明年下屆美國總統大選後的舉債需要。國會兩院先通過政府承諾未來10年削減開支9170億美元的方案，並授權政府將債務上限提升9000億美元，同時，未來10年的各項開支計劃需設控制上限，此為第一階段。第二階段成立由國會兩院議員共同組成12成員委員會，研究整頓稅制和重組社會福利開支，以便未來10年再完成額外削減1.5萬億美元的目標，且於今年11月23日前提交報告。國會兩院將於12月23日前就上述兩項提議進行表決。一，是否接納12成員委員會的削減建議；二，是否修憲，增加要求平衡預算的法律條文，但兩院需各有2/3或以上議員贊成才行。上述兩項議案若未通過，政府債務上限最少都可上調1.2萬億美元；若通過其中一項，債務上限可上調1.5萬億美元，而政

府開支控制上限將於2013年起自動生效。

長遠債務問題未解決

由上可見，美國政府已暫時渡過債務違約危機，且債務上限安全邊際可跨越下屆美國總統大選之後，有助於奧巴馬為積極削減赤字和改革稅制預演綱繆，爭取連任。但鑒於美國經濟持續疲弱，失業率高企和削減赤字，美國債信評級仍被三大國際評級機構列為觀察名單，暫時未有定論。且本輪調增債限方案通過後，將加劇美元貶值，隨着政府回購注資行動的展開，也將提升未來推出QE3的可能，因此，其主權信用評級繼續負面或遭降級仍面臨較大壓力。

美國已成為債務超級大國，美國經濟的癥結在於開支龐大，生產嚴重不足。只要每年開支續增，財赤就會繼續上升，國債是政府財政赤字預算的集中表達，政府財赤賬戶需以國債平衡。因此，若削減赤字，其國債也將繼續上升。可見，美國經濟已陷入靠債務維繫的惡性循環，國會兩院提出與削減赤字掛鈎的債限方案是有深刻道理的。奧巴馬政府提出的振興實業計劃如果不能成功，美國人舉債過度消費的理念如果不能徹底改變，美國政府的削減赤字計劃如果不能有效落實，美國的稅制改革如果不能有效推進，以及美國的國防開支和戰爭開支如果不能大幅壓縮，那麼美國的新經濟和產業結構就難以根本重建，美國債務上限的連番上調都無助美國經濟的根本改觀，美國仍難逃債務違約的終極宿命。

公務員應為香港長遠發展籌謀

藍鴻震 全國政協委員 前民政事務局長

2002年，特區政府推行政治委任制度，由問責局長負責制訂所屬政策局的政策，由公務員出任的常任秘書長，以至一眾高級公務員，看似回復至以往只需聽從指令、執行指令的角色。誠然，為香港長遠發展出謀獻策，問責官員責無旁貸，但高級公務員是否毫無發揮，是否可對規劃事項置之不理，這既非實情，也不現實。作為香港管治團隊的中堅分子，公務員應多抱當家做主的心態，放遠目光，凡事多想一步，考慮長遠的規劃，發揮公務員的所長，為香港長遠發展籌謀。

藍天說地

港澳辦主任王光亞日前在北京與香港大專生交流時，談及香港深層次矛盾，感嘆「成也英國，敗也英國」，直言港英政府管治下，為香港培養了一班高水平的公務員，但他們也只會接受和執行指令，對香港未來的發展，欠缺政治設計和長遠規劃。

中央政府對公務員團隊一直有高度的評價，王光亞上述的言論並沒有推翻這點，更不是所謂向公務員「開炮」。事實上，香港公務員的廉潔和效率，是有目共睹的。王光亞所指的不過是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在港英政府管治期間，對本地公務員的要求，是僅需忠實執行上級的指示，有效率地完成上級指示的工作。至於任何政治設計和長遠規劃，都是由英國政府派來的港督、政治顧問、高層公務員，以至英國外交部負責，本地公務員根本無緣置喙。即



■今年6月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王光亞訪港考察期間，與特區政府主要官員在禮賓府花園合照。

使後期港英政府容許公務員出任政府高層，規劃的權力依然大部分掌握在英國人手中。訓練本地公務員成為政治領導者，似乎甚少聽到。

回歸之後，中央政府秉持「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原則，香港的大小事務、發展規劃，全交由港人負責。公務員作為管治團隊的一員，自然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然而，由於欠缺相關的經驗、歷練，怎樣為未來經濟的發展、社會的發展、政治的發展而籌謀，都是全新方位的工作，需有方向性、創新性、突破性的設計和規劃，公務員難免需時慢慢摸索，大力加強革新的精神和努力。

回歸後公務員在規劃上能有所發揮

2002年，特區政府推行政治委任制度，由問責局長負責制訂所屬政策局的政策，由公務員出任的常任秘書長，以至一眾高級公務員，看似回復至以往只需聽從指令、執行指令的角色。誠然，為香港長遠發展出謀獻策，問責官員責無旁貸，但高級公務員是否毫無發揮，是否可對規劃事項置之不理，這既非實情，也不現實。

在政策制訂的過程，高級公務員有責任協助和配合問責官員，利用他們對有關範疇的經驗和知識，向問責官員提供事實根據、背景資料，以至多項有建設性和實質性的意見和政策選項。最終決策當然由問責官員拍板，政治責任也是由問責官員肩負，但政策制訂的過程中，高級公務員一向是擔當了一定角色。今次王光亞的言論，正正是對公務員的工作起了新啟示，除了與問責官員商討眼前推行的政策，做好今天的事外，也應探索如何在負責的工作範圍內，多走一步，考慮未來的發展，提出新思維，與問責官員共同進行長遠的設計，長遠的規劃，所有專業層、高級及首長級的公務員，在這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職責。

作為香港管治團隊的中堅分子，公務員應多抱當家做主的心態，放遠目光，凡事多想一步，考慮長遠的規劃，發揮公務員的所長，為香港長遠發展籌謀。

請為長者提供更方便的門診預約服務

葉偉明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

為理明言

醫院管理局在2006年引入普通科門診電話預約服務，希望可以改善每天清晨有大批長者在門診部外排隊求診情況。無可否認有關情況雖有改善，但電話預約服務仍存在不少問題，有長者仍未能利用有關系統預約門診，故醫管局及有關當局應研究如何完善有關系統，讓長者可以用最方便有效方法獲得適切診治。

在過去5年，不能否認醫管局內曾推出多項改善電話門診預約服務措施，例如提供「長者預約專線」、系統電話線由350增至500多條、推出傳真方式預約服務等，但本人及社區幹事仍不時收到市民投訴有關預約系統種種問題。

工聯會較早前公布一項調查發現仍有超過一半(51.7%)受訪者指現時透過電話預約普通科門診服務是非常困難，問題包括名額經常爆滿(53%)、電話經常無法接通(49.3%)、手續繁複(40.9%)等，故當局應該深入了解預約系統仍有哪些需要改善空間。

在當日記者會上，有兩位長者現身說法，有助大家了解問題所在。詹伯伯因工受傷，本欲預約覆診，但因聽力不足及反應遲緩，根本難以跟從系統指示完成門診電話預約服務，最後需要家人協助方能解決問題；胡婆婆曾因高血

壓暈倒，但由於不懂廣東話(母語為潮州話)，故電話預約時根本不能聽清楚語音指示，亦無法預約，最終導致延誤診治。

由此可見，部分長者基於身體機能退化或語言問題，根本未能用上電話預約系統，這群長者亦極需額外支援。調查便清楚顯示，71%受訪長者建議有關當局增設長者預約專線，由真人接聽，協助長者預約門診；47%受訪者則認為要簡化電話預約手續及程序。

據醫管局提供資料顯示，經電話預約系統而使用門診服務的病人中，約有四分之一的使用者為65歲或以上的長者，故顯示長者對門診服務需求殷切。我認為當局可以考慮擴大現行長者醫療券計劃，將醫療券總值由500元增至1000元，在「錢銀老人走」下，長者可以在私人醫療市場選擇最方便的求診途徑，不用再受政府普通科門診電話預約系統阻礙。

當然政府亦需要全面檢討運作了五年的門診電話預約服務，當局應增設長者預約專線，由真人接聽，切合長者需要；亦應考慮增設網上預約門診服務，把每天最新的街症籌數同步更新，令街籌的制度進一步透明化。現時香港人口老化問題迫在眉睫，醫療是長者最關心的問題，政府在推行醫療改革同時，應以市民福祉為依歸，特別關愛長者的需要。

南海爭端的激化既對中國發展構成挑戰，也為中國海權拓展提供了良機。中國的傳統威脅主要源自陸地尤其西北邊疆，歷代不斷整修的「萬里長城」即是中國偏重陸上防禦的典型寫照。17世紀鄭和七下西洋時，正值國運鼎盛時期，可惜此後由明至清卻厲行海禁，「不許片帆入海」，保守防禦的缺陷暴露無遺，埋下此後百餘年海陸兩面同時受壓的禍端。

19世紀西方列強由海路梯次侵華，中國延續千年的國防戰略再也難以維持，當時引發了以左宗棠為代表的「塞防論」和以李鴻章為代表的「海防論」的激烈論爭。同治和光緒時期兩次「海防議」的結果，使清廷由「專防內地」轉向「海口防禦」，此間打進北洋、南洋、福建、廣東四支海軍。至光緒十五年(1889)時，清廷海軍已能排至世界第九位，在歐洲諸強之後，美國、日本之前。但此時清廷衰微敗敗之勢已大體底定，海軍建設只是徒有其表，幾年後，甲午海戰一敗塗地，中國再也無力翻轉局面。

發展海權已經變得迫在眉睫

歷史的教訓值得銘記。在去年中國經濟超過日本成為亞洲「首富」之後，國力的增長到了可以再次面向海洋重新做出選擇的時候了。實際上，發展海權已經變得迫在眉睫。明清盛世時期「天朝」獨大，海防威脅還主要源自海盜的不對稱騷擾，致使其缺乏海患意識，加之不屑為商，索性關起門來。如今卻大不一樣，中國不再是東亞體系裡「四方來朝」的中心帝國，沿海從南到北，也非一片寧靜，早已被相互交織重疊的劃界線區分得支離破碎，佈滿了各國的旗幟，鑽井和越來越多的艦艇，成為當前威脅的最大源頭。

不僅如此，與歷史上的歷代王朝不同。一方

南海爭端：挑戰也是機遇

李因才 復旦大學國際關係博士

面，中國重心在向東部沿海傾斜，東部地區10省集中了全國近40%的人口，57%的年度GDP。另一方面，中國觸角迅速向外延伸，海外資產、公民數量劇增，出口市場的開放、能源與資源的穩定供應、航空安全與暢通以及交往密切化的政局發展，都越來越關乎中國利益。缺乏能力保護和應對已經成了北京的最大難題。

令人欣慰的是，經過幾十年的艱苦談判，長期困擾中國的陸上傳統威脅基本消除。除印度外，中國已解決和所有其他陸上鄰國的邊界糾紛。這使中國可以騰出手來，將精力投向廣闊的「深藍」。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越、菲南海「玩火」的同時，中國及其北方鄰國卻在慶祝上合組織成立10周年以及《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簽署10周年，他們借此機會進一步強化了相互間的政治、經濟合作。此外，在蒙古國總理蘇赫巴特爾、巴特包勒德來訪期間，中蒙也由於鄰互信夥伴關係提升為戰略夥伴關係。在應對海洋大國美國及其盟友的挑戰上，陸地正由之前的主要威脅轉變為提供力量支撐的戰略後方，尤其是中俄這兩個陸上強鄰發展出的「背靠背」式的「準聯盟關係」，是中國目前對沖海權挑戰的重要根基。

不過，策略的應用當慎之又慎，尤其要避免鋒芒畢露，讓兩條防線同時感受到壓力。根據地理政治特徵，時殷弘先生認為中國類似於歐洲的法國和德國，屬典型的「陸海複合型國家」。這類國家歷史上「無論多麼強大，都很難長期成為陸海兩棲性強國」，而且由於同時「面向陸海兩個方向，因而通常必須面對陸海兩方面的壓力」，具有「雙重易受傷害性」。這種類似儘管並不十分準確，但對當下的中國卻頗有教益。